



会泽水城扩红遗址

见证红九军团征战岁月

本报记者陈泓洁

坐落于会泽县城西北四公里万额山脚的水城扩红遗址，背山面水、环境清幽。遗址内千余棵百年古梨树连片成林，素有“梨园”之称。

1935年5月1日至5日，红九军团长征途经会泽，打富济贫、为民除害、开仓放粮，宣传革命思想，唤醒劳苦大众。红军严明的纪律、亲民的作风、坚定的信念，深深打动了会泽群众。

5月4日，红九军团在水城梨园召开动员大会，军团长罗炳辉、政委何长工作动员员讲话。群众踊跃参加红军，短短数日，成功扩红1500余人。部队将新入伍的热血青年整编为崭新的红军营，由军团作战科长刘雄武担任营长。

古朴清幽的水城梨园，成为红九军团长征途中重要的新兵集结地、整训地，也成为会泽最具代表性的长征纪念地。水城扩红遗址由扩红台、红色文化广场、史迹陈列馆三大部分组成，气势恢宏、庄严肃穆。

2004年建成的扩红台占地2637平方米，垂直高度28.295米，共设188级台阶。“乌蒙磅礴”大型群雕长18米、宽6米、高11.7米，重550吨。群雕造型逼真、栩栩如生，雕塑最高达9.9米，寓意红色精神长久永恒。

水城红军史迹陈列馆占地面积7500平方米，于2016年完成全面布展，分为乌蒙明珠、星星之火、红色铁流、星火燎原、再谱新篇五大篇章，以实物陈列、场景复原、图文解说、声光科技等形式，全方位、立体化再现了会泽革命奋斗史与发展史。其中，重点记录展示了红九军团扩红盛况及19名会泽籍老红军的光荣往事，为后人留下珍贵鲜活的红色史料。



“乌蒙磅礴”大型群雕。王良忠 摄

水城扩红遗址是熠熠生辉的红色地标，是全国100个红色旅游经典景区之一，是曲靖市文物保护单位、曲靖市干部党性教育基地、云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云南省国防教育基地、云南省革命遗址。

马龙区旧县街道红桥村

群众守护红军标语七十余载

本报记者陈泓洁



标语（局部）。张立志 摄

在马龙区旧县街道红桥村，一条书写在农家板壁上的红军标语，历经岁月洗礼，成为当地珍贵的红色历史见证。

1935年4月28日，中央红军一军团途经马龙，下午4时进驻古驿道草鞋板桥（今红桥村）宿营。受国民党宣传蛊惑，当地青壮年大多躲入山中，村内只留下老人、妇女与孩童。

红军进村后，在村边石桥召开群众大会，惩处地方恶霸，开仓分财，救济贫苦百姓。红军严格遵守群众纪律，帮群众挑水、扫地、干活。同时，书写革命标语，宣传救国道理。为躲避敌机轰炸，红军叮嘱农户不要生火，饭菜由红军统一供应。

红军宣传队借宿在村民宋学义家中，便在

宋家木板壁上写下“苏维埃新中国万岁”八个大字，进一步向群众宣讲革命主张。红军撤离时，还赠予宋家木盆、筛子等生活用品。

红军离开后，国民党追兵随即抵达，下令全面清除红军标语，隐瞒不报者治罪。宋家感念红军善待百姓的恩德，冒着杀身之祸，用草席严严实实遮盖住标语，严守秘密，将这条标语悄悄保护下来，直至新中国成立。

新中国成立后，宋学义参加工作，学习文化知识。1962年，驻村工作组到访，这条隐藏在宋家老屋檐板壁上的革命标语才对外公开。1974年，经马龙文化馆、马龙红军史料征集办上报，这条标语得到妥善保护。

宋学义一家主动将板壁标语连同红军《战斗步兵条例》一并上交云南省考古研究所收藏，后人藏云南省博物馆。2011年，马龙博物馆建成，标语复制品入馆对外展出。

这条历经风险保存下来的红军标语，是中央红军长征过马龙的鲜活实证，成为马龙传承红色基因、赓续长征精神的重要载体。

红色遗物铁漏勺和铁勺

镌刻红军长征为民初心

本报记者陈泓洁

在沾益区文物管理所，珍藏着一件看似普通却承载厚重红色记忆的革命文物——红军铁漏勺。这件器物历经岁月洗礼，保存完好，默默诉说着1936年红军长征途经沾益的往事。

该文物为铁质生活用具，整体形制完整、做工朴素。铁漏勺配有直式长柄，柄体中空，柄尾呈椭圆形、尺寸略宽于柄身。勺体为椭圆形，盘面均匀分布圆形小孔，整齐排列为七圈，设计简洁实用。器物长45.5厘米，其中柄长35.5厘米，勺体长10厘米。

1936年4月，红二军团长征途经沾益，在行军驻扎、炊事劳作、服务群众的日常中留下这把铁漏勺。1975年，原沾益县盘江镇小后所村村民王德昌将这件红色器物主动无偿捐献，让红色遗物得到专业保护、代代相传。

目前，这把红军铁漏勺整体保存完好，被收藏于沾益区文物管理所。

每一件红色文物，都是一段鲜活的革命历史。

在宣威市虎头山红军烈士陵园纪念馆内，珍藏着一把朴实无华的红军铁勺，它静静诉说着红二、六军团长征途经宣威的峥嵘岁月与军民深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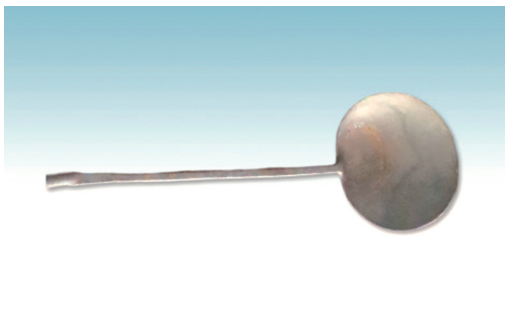
该文物为红军日常餐具，圆形勺体直径8.7厘米。文物整体结构完整、古朴厚重，带有鲜明的使用痕迹。这把铁勺是红军炊事班分发饭菜的器具，镌刻着红军集体生活的记忆，见证着红军风餐露宿、艰苦卓绝的征战历程。

1936年3月，红二、六军团途经宣威田坝一带，将这把铁勺赠予当地村民张发光。1974年4月，张发光将珍藏多年的红军铁勺捐献给原宣威县文化馆，后收藏于宣威市虎头山红军烈士陵园纪念馆。

红军铁勺不仅是红军集体生活的见证，更折射出艰苦时期红军官兵一致、同甘共苦、团结



铁漏勺。沾益区文物管理所 提供



铁勺。黄凯 提供

乐观的优良作风。

一勺饭菜暖军心，一份真情系百姓。这把历经烽火岁月的铁勺，是长征精神的微观载体，也是乌蒙大地军民同心、患难与共的生动见证，为后人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提供了鲜活的实物史料。

深海神秘而危险，却也暗藏无数失落的财富。当沉没的宝藏被打捞出水，历史的碎片随之浮现，我们得以拼凑出一段段被海水封存往事。

6月6日起，位于天津的国家海洋博物馆为纪念即将到来的中国水下考古事业发展四十周年，与中国海洋学会海洋遗产保护专业委员会暨海洋博物馆联盟推出“沉没的宝藏——水下考古文物珍品展”。400余件出水文物在此展出，勾勒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繁华图景，见证我国水下考古的发展历程。

展厅内，16处古代沉船遗址专题展区，通过珍贵出水文物向观众讲述考古发掘、历史文化、文物保护等多方面内容。在被深蓝色包裹的展厅中央，造型精致的唐白釉绿彩立雕游鱼吸杯吸引不少游客的目光。杯中一只瓷鱼，鱼腹暗藏吸管连通杯底，注酒后瓷鱼似在杯中游动，设计独具巧思。

这件唐白釉绿彩立雕游鱼吸杯是唐代邢窑外销瓷器的代表性器物，出水于“黑石号”沉船。约1200年前，这艘阿拉伯商船在驶往波斯湾的途中沉没，船上满载着60000余件器物，其中55000余件都是我国长沙窑的瓷器。

同样出水于“黑石号”沉船的唐长沙窑褐绿彩绘阿拉伯文碗，是唐代海上丝绸之路文明互鉴的见证。碗心的纹样融合变体阿拉伯文与中华传统云纹，线条流畅，呈现出多色交织的效果。

船只连接起相隔万里的市场与文明，构筑起早期的“全球化”网络。10世纪的移动“海上购物车”——井里汶沉船中的宝藏展现出复杂的跨国贸易网络。据估算，井里汶沉船上有近50万件货物，以越窑青瓷为主，涵盖西汉钱币、中东玻璃器、东南亚香料等共500多类船货，是当时南海贸易繁荣与活力的缩影。

走进“时光的宝箱”篇章，一句话引人沉思：“当寻宝者带走珍宝，历史便碎了；当考古者打开胶囊，时光才醒来。”

国家海洋博物馆副馆长王龙介绍说，曾经由于海洋考古事业缺失、海洋科技装备落后等原因，我国海洋文化遗产一度成为西方“盗宝者”盗窃的对象。

展厅内，“南海Ⅰ号”沉船考古大事记讲述着中国水下考古事业起步时的艰辛。从1987年“南海Ⅰ号”沉船被意外发现，到2007年古沉船整体打捞正式实施，“南海Ⅰ号”沉船见证了中国海洋考古事业从无到有、由弱变强的不平凡历程。直至2022年，通过采用首创的“弧形梁非接触文物整体迁移技术”，长江口二号古船成功实施整体打捞，展现了我国水下考古的高效与创新实力。

国家海洋博物馆馆员王媛媛说：“我国水下考古工作发现沉船遗址、挖掘出大量陶瓷器等历史遗存，证明我国先民早期发现和经营南海诸岛的史实，为维护国家海洋主权提供不可辩驳的历史物证。”科学考古视野下的沉船，不再是零散的宝藏，而是密封的“时光宝箱”。

“中国水下考古肇始于1987年，到2027年就满40年。”王龙说，“如今，我们有能力守护沉船所承载的历史记忆，我们会学打捞器物，最终懂得我们打捞的是文明。”

王龙说：“很多观众第一眼被‘沉没的宝藏’吸引，我们由此在开篇用一件重磅金器‘南海Ⅰ号’金项链引入主题。”

1987年，中英联合搜寻队在广东上下川岛附近海域作业时，抓斗里第一批即带出长1.72米的金腰带和瓷器残件等，中方人员敏锐判断这并非英方要找的“莱茵堡号”，随即叫停商业抓捞，保住了一艘南宋远洋商船，成为中国水下考古事业起步的标志性事件之一。

“南海Ⅰ号”被整体打捞后，又陆续出水大量金器，这次展出的金项链正是典型代表。它们工艺精美，带有明显的中西混合风格，并且留出镶嵌宝石位置，极可能是宋代工匠为海外市场定制的“外贸金饰”。真正的宝藏不是贵金属本身，而是器物背后一整套不可再生的历史信息全息图谱。宋代远洋贸易、海上丝绸之路之上人与物的流动，全系在了同一束金光里。

“中国水下考古事业发展即将迎来四十周年。如今，‘深海勇士’号载人潜水器已能够下到南海西北陆坡1500米，把明代沉船散落状态实时传回水面。科技能力重新定义了我们能讲什么样的海洋故事。”王龙说。

“在展览结尾，我们不写结论、只留开放设问，就是希望观众离开时，从看热闹的‘寻宝人’，变成水下文明的共同守护者。这就是‘沉没的宝藏’想交还给公众的‘真宝藏’。”王龙说。

（新华社天津8月21日电）

深海寻宝，打开沉睡千年的「时光宝箱」

新华社记者包庆龄